

## 从朱彝尊《史馆稿传》到 《明史·文苑传》的文献考察\*

谢 一 丹

**内容摘要:**清初史官朱彝尊纂有《史馆稿传》一卷,此稿为《明史·文苑传》之初稿,收录了明代洪武至成化间 90 名文人。朱彝尊采人入传和书写传记时集中取材于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,由此绘制出以参修《元史》文人群、北郭十友、闽中十才子等为代表的明前期文苑图谱。万斯同撷取《史馆稿传》半数以上人员入《明史·文苑传》,王鸿绪、张廷玉基本沿袭,明前期文人群体由此确立。与此同时,万、王、张也调整传记次序、新增传主、剪裁传文,逐步强化宗经重道的古文观。朱彝尊在《史馆稿传》中传递的崇唐诗歌观,却随着高启、袁凯、高棅传记的修订被淡化。考察《史馆稿传》的纂修过程、传记构成、史料来源及其至武英殿本《明史·文苑传》的变更,有助于发掘《史馆稿传》的文献价值,辨明《明史·文苑传》的修纂过程。

**关键词:**朱彝尊 《史馆稿传》 《明史·文苑传》 《列朝诗集》

朱彝尊撰有一卷本《史馆稿传》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手稿本,清冯登府跋”<sup>①</sup>,《中国古籍总目》亦著录“手稿本(清冯登府跋),上海;风雨楼秘笈留真本”<sup>②</sup>。手稿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,一册,正文共计 53 叶,全书以楷书写成,无板框、栏线,每半叶 10 行,行约 21 字,行间有小字增补、更改,天头有冯登府校语,文中多处圈点、勾划,卷前有冯登府跋文。清末藏书家邓实所辑《风雨楼秘笈留真》亦收影印手写本《史馆稿传》一卷,封面郑文焯题“朱竹垞手写《史馆稿传》,风雨楼秘笈留真之三”<sup>③</sup>,卷首新增邓实题记,是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明人传记文体关系研究”(20BZW095)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“《明史·文苑传》文学史书写研究”(22lzujbkys005)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90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88-89页。

③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54册,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页。

为风雨楼秘笈留真本。此本《清史稿〈艺文志〉拾遗》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《重修清史艺文志》著录,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均有收藏,并为《丛书集成续编》和《二十四史订补》所收。

近年来学者已经关注到《史馆稿传》与《明史·文苑传》之间的联系,邓国光指出《史馆稿传》与《明史》文苑人物传记相关,意在纠正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的偏颇,基于这种冰炭不容的差异,朱稿的主体部分被馆臣搁置了<sup>①</sup>。叶晔在论述明代庶吉士教习范本与馆阁文学传统时,引入朱彝尊《曝书亭集·高棅传》,说“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中明初作家的传记底稿,是由当时的翰林院检讨朱彝尊初撰的”<sup>②</sup>,却未言明底稿是《史馆稿传》。鉴于这些研究未能对《史馆稿传》本身及其与《明史·文苑传》的关系展开全面论述,本文试图考察《史馆稿传》的纂修过程、传记构成与史料来源,并分析其与万斯同、王鸿绪、张廷玉三版《文苑传》在传主选取、传记排列、传文书写等方面的差异,探讨《史馆稿传》的文献价值。

### 一、《史馆稿传》的编纂与构成

康熙十八年(1679),清廷征召博学鸿儒纂修《明史》,为便于修史工作顺利展开,监修总裁制定了分类分期的编纂模式。李晋华据尤侗《明史拟稿序》和方象瑛《明史分稿自序》以及毛奇龄《史馆奉总裁劄子》推测出《明史》纂修所分时段为三:“洪武至正德各朝为第一期(十九年正月至二十年六月),泰启祯三朝为第二期(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),嘉隆万三朝为第三期(二十一年四月以后)。而每期又以纪、志、表、传等类,分五班撰述。”<sup>③</sup>照此说来,《文苑传》也应依据时代划分成数段,被委派给不同的史官。

史料多载史官尤侗和汪琬分得《文苑传》稿。尤侗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,授翰林院检讨,入史馆纂修《明史》,二十二年(1683)乞假归。尤氏所修《文苑传》收录在《明史拟稿》卷四中,收弘治、正德间文人传记15篇<sup>④</sup>。汪琬于康熙十八年入史局,在馆仅六十日。汪琬纂得传稿175篇,后将其汇为《别稿》二十四卷,收入《钝翁续稿》中。《钝翁续稿》卷五二、五三为《文

① 邓国光:《文章体统: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443页。

② 叶晔:《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45页。

③ 李晋华:《明史纂修考》,《民国丛书》第4编74册,上海书店,1993年,第22页。

④ 分别为《李梦阳传》《何景明传》《徐祯卿传》《边贡传》《康海传》《王九思传》《桑悦传》《杨循吉附都穆》《唐寅附张灵》《祝允明传》《文徵明附陆师道、陈淳、彭年、钱谷、居节、周天球》《蔡羽附王宠》《何良俊传》《杨慎传》《王廷陈附颜木》。

苑传》(即《别稿》卷二二、二三),共有传记12篇<sup>①</sup>,传主乃洪武至正德间文人。

馆臣朱彝尊也分纂了《明史·文苑传》稿,彝尊家信有载“岁前分嘉靖诸臣传……又分得三百年文苑、诸王传”<sup>②</sup>。冯登府撰有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(以下简称“冯登府跋”),中言“《明史》汪克宽入《儒林》,王冕、赵壘、赵搢谦、徐一夔、高启、孙蕡、王蒙、袁凯、刘溥、杨维桢并入《文苑》列传,皆与原稿不合,惟林鸿、王蒙、沈度、王绂四传,全用先生稿也”<sup>③</sup>。检视武英殿本《明史》,发现王冕、赵壘、林鸿等确为《文苑传》收录,是以《史馆稿传》当为朱彝尊所纂《文苑传》。冯登府跋又载“是年五月,开局东华门外,分纂《文皇帝纪》。明年冬,分撰《嘉靖诸臣传》,是稿皆上史馆之作,当在此时”<sup>④</sup>。“是年”指康熙十八年,该年朱彝尊分纂《文皇帝纪》,次年编修《史馆稿传》。结合李晋华考辨出的《明史》分期纂修模式,可知《史馆稿传》为第一期“洪武至正德”间的修史任务。

冯登府又言“是稿三十篇,皆见全集中,多改易亲笔也”<sup>⑤</sup>，“全集”指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。《曝书亭集》卷六二至六四悉数收入《史馆稿传》，当是朱彝尊亲笔改易、自编入集。正如邓实《〈史馆稿传〉题记》所言：“其时史馆不能全用，竹垞乃自珍其稿，至晚年统编入《曝书亭集》内。”<sup>⑥</sup>然《曝书亭集》相对《史馆稿传》多出汪克宽、王冕、钱龙锡、崔子忠陈洪绶合传、李无垢五篇传

①“文苑一”收《杨维桢附郭冀》《苏伯衡传》《张孟兼传》《袁凯传》《高启附杨基、张羽、徐贲、王彝》《宋克传》《王行传》，“文苑二”收《杨循吉附都穆》《唐寅传》《徐祯卿附黄省曾、黄鲁曾》《祝允明附桑悦》《文徵明附陈道复、陆师道、王宠、王谷祥、彭年、周天球、钱谷、文彭、文嘉》。

②朱彝尊著，王利民等校点：《曝书亭全集》，《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》卷十一《彝尊家信十札（其三）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018页。

③冯登府：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六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733页。

④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，第3页。《史馆稿传》卷前也载有冯登府跋文，与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六所载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稍有不同，此处引文在《石经阁文初集》中作“是年五月，开局东华门外，分纂《文皇帝纪》。明年冬，分撰《嘉靖诸臣传》，是稿三十篇，皆见全集中，多改易亲笔也”（冯登府：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六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，第733页）。

⑤冯登府：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六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，第733页。

⑥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，第2页。

记。冯登府认为汪克宽、王冕二传乃传稿所缺<sup>①</sup>，当补入。李晋华又指出钱龙锡传、崔子忠陈洪绶合传、李无垢传非朱彝尊为史馆所作之稿<sup>②</sup>。是以《史馆稿传》当有文人传记 32 篇，而非 30 篇。《史馆稿传》分传一、传二、传三，传一下有目录，即汪克宽、贝琼（宋禧）、王彝（杜寅、张简）、赵璵、陈基、高启（谢徽、傅著）、傅恕、朱右、王廉、朱廉（徐尊生），传二、传三下无。邓实《〈史馆稿传〉题记》解释道：“惜下半页已残缺，故只有传一之目，而无传二、传三之目。”<sup>③</sup>由于《曝书亭集》卷六二到六四传记顺序与《史馆稿传》传文内容一致，又收后者所缺之汪克宽、王冕二传，应可以卷六三、六四对应后者传二、传三。

《史馆稿传》共收传记 32 篇，传主 90 人。传一收录 10 篇传记，16 人，前已言及。传二有 16 篇传记，66 人，主要由“北郭十友”“闽中十才子”“南园五子”“东南五才子”“景泰十才子”这些文人群体组成<sup>④</sup>。传三有 6 篇传记，共 8 人，即《王冕传》《杨维桢附钱惟善、陆居仁》《徐一夔传》《刘永之传》《赵搢谦传》《答禄与权传》。

传二所收合传最多，第一篇《戴良附王逢》，二人都是元代遗民；第三篇《钱宰附张美和、许中丽》，三人同在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被召定正《尚书》；第四篇《徐贲附宋克、陈则、余尧臣、吕敏》和第五篇《袁凯附顾禄、管讷》为一个单元，他们都是吴中诗家；第六篇传记主要由“南园五子”组成，即《孙蕡附王佐、黄哲、李德、赵介、黎贞、唐豫》；第八篇《林鸿附浦源、郑定、唐泰、王恭、陈亮、黄玄、周玄》，他们属于闽诗派成员；第十四篇《王绂附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》和第十五篇《沈度附沈粲、夏昺、滕用亨、陈登》，诸人或精于书法，或擅长绘画；第十六篇《刘溥附刘珏、苏平、苏正、沈愚、晏铎、王淮、蒋忠、邹亮、汤胤

①冯登府言：“考全集尚有汪克宽、王冕二传，此其所缺也。”（冯登府：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六《朱竹垞检讨〈明史馆传稿〉跋》，第 733 页）

②李晋华称：“钱龙锡因袁崇焕之斩毛文龙而下狱，后虽遇赦，然已含冤莫白，彝尊为之作传，或欲以剖其冤也。崔、洪同为崇祯间名画师，艺同癖同，因合为一传。至李无诟乃清初一医士。”（李晋华：《明史纂修考》，第 77 页）

③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，第 2 页。

④朱彝尊在《徐贲传》中言及“北郭十友”，在《林鸿传》中论及“闽中十才子”，在《孙蕡传》中提及“南园五先生”，在《王洪传》中叙及“南园五才子”，在《刘溥传》中谈到“（景泰）十才子”。



勳、王贞庆》，除刘珏外传主皆为“景泰十才子”成员<sup>①</sup>。合传是史传常见的书写模式，朱彝尊根据政治、地域、流派、技艺等元素整合人物，既能有效地控制篇幅，又便于文学团体和诗文观念的呈现。

《史馆稿传》有着相对清晰的时间上、下限，但这并不意味朱彝尊完全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传记，从“传一”首篇《汪克宽传》到“传三”末篇《答禄与权传》，看不出以一以贯之的时间顺次。“传一”由明初参修《元史》的汪克宽、贝琼、王彝等人组成，可以说是政治性文人群体集合，朱彝尊将其置于“传一”，可见其对修史的重视与认同。“传三”都是元明易代文人，成员构成比较复杂，缺乏共通点。“传二”的时序相对明显，传主出仕时间可作为证明，第一人戴良<sup>②</sup>元末以荐授淮南、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；第二人唐肃洪武三年（1370）被擢应奉翰林文字；第三人钱宰洪武六年被授国子监助教；第四人徐贲“洪武七年用荐起”<sup>③</sup>；第五人袁凯“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监察御史”<sup>④</sup>；第六人孙蕡“洪武三年举乡试，授工部织染局使”<sup>⑤</sup>；第七人王蒙“洪武初知泰安州事”<sup>⑥</sup>；第八人林鸿“洪武初以人材荐授将乐县儒学训导”<sup>⑦</sup>；第九人王偁永乐初被授国史院检讨；第十人孙作洪武六年（1373）聘修《大明日历》，书成授翰林编修，乞改太平府教授；第十一人叶子奇，洪武初用荐授巴陵主簿。以上除王偁外的诸人都在洪武初出仕。此后第十二人至该传末第十六人，王洪中洪武三十年（1397）进士，授行人；高棅、王绂、沈度都在永乐初期出仕；刘溥则在宣德初被授惠民局副使。由此可知，仕履时间是朱彝尊排布传记次序的重要参考因素。而第九人王偁的乱入，则是因为他是闽诗派成员，所以紧随林鸿传后，时间顺次为地域因素所打破。实际上，针对“传二”前半部分这些洪武初入仕的文人，朱彝尊又设置了二级标准，即依据地域因素排列传记：第二篇传记中唐肃、谢肃是浙江诗人，第四、五篇中徐贲、宋克、袁凯等是吴中诗人，第六、八篇则分别是岭南诗派和闽诗派成员。

①“景泰十才子”是活跃在景泰年间的文学团体，虽有“十才子”之名，却并非以《史馆稿传·刘溥传》所载十人为限，详见殷飞：《“景泰十才子”研究》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8年，第9-12页。

②所谓“第一人”指“传二”第一篇合传《戴良附王逢》中的主传传主，此后“第二人”至“第十六人”分别对应“传二”第二至第十六篇传记的合传主传传主，或单传传主。

③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徐贲传》，第13页。

④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袁凯传》，第14页。

⑤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孙蕡传》，第14页。

⑥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王蒙传》，第15页。

⑦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林鸿传》，第16页。

《史馆稿传》无序言或论赞,但可从传记中的文学批评与史料剪裁探究朱彝尊意欲传递的诗文观。“传一”陈基、朱廉、朱右都从学于金华黄潛,戴良受业于柳贯,王彝文得金履祥之传。陈基为文“雍容纤徐”<sup>①</sup>,朱廉为文“谨严精密”<sup>②</sup>,朱右为文“深醇精确,简而有度”<sup>③</sup>。这些浙东文人的文章观与朱彝尊宗六经、重学问、求醇雅的文学思想吻合<sup>④</sup>。朱彝尊常引传主文章入传稿,比如他在《王彝传》中引入王彝所作《文妖》,王彝视杨维桢之文为“文妖”,“以淫词谰语裂仁义,反名实,浊乱先圣之道”<sup>⑤</sup>。侯荣川认为王彝力诋杨维桢文既与王彝的学脉传承相关,更为重要的是,王彝试图建构文道合一、辅俗化民的明初实用主义文学,以扭转元末以来靡丽曼衍的审美主义思潮,元末文坛泰斗杨维桢高扬个体意识的文学实践,自然就成了他攻击的靶子<sup>⑥</sup>。朱彝尊引《文妖》入传,固然是因为他主张“凡学诗文,须根本经史,方能深入”<sup>⑦</sup>,与王彝所持“文者,道之所在”<sup>⑧</sup>的文道观念契合,也不能排除其试图效仿王彝建立宗经重道的新朝文学观之意图。

朱彝尊的诗歌宗尚在《高棅传》《孙蕢传》中有所表现,他评价高棅说:“论者谓其诗音节可观,神理未足。然棅之言曰:‘余夙耽诗,恒欲窥唐人之藩篱。首踵其域,如堕终南万叠间,茫然弗知其所往。然后左攀右涉,晨跻夕览,下上登顿,进退周旋,历数十年,厥中僻蹊、通庄、高门、邃室,历历可指数。’盖其学之专如是,终明之世,馆阁宗之。”<sup>⑨</sup>“其诗音节可观,神理未足”出自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高棅小传。朱彝尊借高棅自言与馆阁宗尚,力证高棅于唐诗用力颇深,诗论主张确有可取之处,钱氏之论不足为信。

《孙蕢传》载“德为诗效李白、李贺,孙蕢嘲之曰:‘子真混元皇帝云孙也。’”<sup>⑩</sup>,此言黄佐《广州人物传》也有记载,它的后一句是“德乃力追古作”。

①陈基:《夷白集》卷首“戴良《序》”,明弘治八年(1495)张习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,叶一。

②傅维麟:《明书》卷一一一《朱廉传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39册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482页。

③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朱右传》,第9页。

④朱则杰将朱彝尊的文学思想概括为“宗六经、重学问、求醇雅”(朱则杰:《朱彝尊研究》,凤凰出版社,2020年,第33页)。

⑤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王彝传》,第5页。

⑥侯荣川:《王彝“文妖”说与明初文学批评》,《北方论丛》2011年第4期,第14-18页。

⑦朱彝尊撰,吴肃森编校:《曝书亭词》附录一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412页。

⑧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王彝传》,第5页。

⑨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高棅传》,第19页。

⑩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孙蕢传》,第15页。

孙蕢讥讽李德一味模拟唐人李贺,取法太窄,所以李德改而追求“古作”,即陶渊明诗歌<sup>①</sup>。朱彝尊《孙蕢传》虽取材自《广州人物传》,但他删去“德乃力追古作”后,孙蕢的嘲讽便成为善意的戏谑,李德也并未因此改变宗法对象,作诗依然学唐人。从朱彝尊对《高棅传》和《孙蕢传》的增删可以看出其在诗学上的宗唐倾向。

## 二、《史馆稿传》以《列朝诗集》为主要史源

《明史》史料来源丰富,雍正时参修《明史》的杨椿回忆曰:“监修徐公发凡起例,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,凡四百一十六卷。先是以《明实录》疏漏脱略,不得已采之稗史,而稗史惟王元美《史料》为胜,然时止于正、嘉,事未尽稽乎《实录》。而郑室甫《吾学编》舛讹已不可尽信,其他杂纪、小说、郡志、家状讹谬尤多。……稿虽就而未敢以进也。”<sup>②</sup>馆臣注意到前代史料各有阙误,官修实录“疏漏脱略”,稗史《弇州史料》《吾学编》等也存在纪事不全、舛误繁多等问题,其他类型的史料更是谬讹尤甚,故而他们修《明史》时,应是广泛参阅了国史、稗史、家乘、方志、笔记、别集等,朱彝尊《史馆稿传》亦当如此。

在众多史源中,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值得格外关注。朱氏《史馆稿传》对钱氏诗家小传的采摭可从细节处寻得踪迹。《贝琼传》载“琼,一名阙”<sup>③</sup>,钱氏云“而贝琼本字廷臣,则阙乃琼之别名,非两人也。今正之”<sup>④</sup>,贝阙之名明显取自钱氏考证;《高棅传》载“论者谓其诗音节可观,神理未足”<sup>⑤</sup>,此诗评正出钱氏之口。朱氏参照《列朝诗集》的方式并非只引少许钱氏诗评与考辨成果入传,而是在事件选取、叙述方式、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对钱氏小传多有吸收。经比勘,《史馆稿传》陈基、戴良、唐肃、王蒙、王洪、刘溥、杜寅、镠绩、毛铉、吕敏、王佐、黄哲、李德、郑定、王褒、唐泰、王恭、陈亮、黄玄、张宣传与钱传相似度甚高,两者的区别仅限于个别事件的选取和字句的更改。

就理论而言,《列朝诗集》较其他史料晚出,又自有其史源,所以《史馆稿传》与钱氏小传之间的近同很难证明前者直接采摭后者,而非他们共同拥有

①陈恩维:《试论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——以明初“南园五先生”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广州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5期,第90-96页。

②刘承乾:《明史例案》卷七《杨农先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》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5辑第4册,北京出版社,2000年,第620-621页。

③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一”《贝琼传》,第4页。

④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卷十五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592页。

⑤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高棅传》,第19页。

的更为原始的文献。然《史馆稿传》所呈现的那些与《列朝诗集》相似度甚高的传记,似乎在提示我们朱彝尊对《列朝诗集》青睐有加。他以钱氏小传为蓝本,对其进行增删改定,并以此为支点旁涉与传主相关的其他碑志、文集、笔记等史料,而非越过《列朝诗集》径直采录原始文献。兹以《刘溥传》(见表1)和《戴良传》为例说明:

表1 刘溥传对比

| 《〔正德〕姑苏志》刘溥传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列朝诗集》刘溥小传             | 《史馆稿传·刘溥传》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祖彦敬,事太宗于潜邸,为良医。                  | 祖彦敬,以良医事太宗潜邸。          | 祖彦敬,以医事文皇帝。   |
| 宣德初,以文学征。有言其善医者,遂以为惠民局副使。        | 宣德初,授惠民局副使。            | 宣德初,授惠民局副使。   |
| 其诗初喜西昆,所拟辄似,晚益奇纵。自经时变,悲愁叹愤,一寓于诗。 | 其诗初拟西昆,晚益奇纵,悲愁叹愤,一寓于诗。 | 其诗初效西昆体,久益奇纵。 |

《国朝献徵录》和《〔正德〕姑苏志》(以下简称“《志》传”)都录有刘溥传,前者名为《太医院吏目刘溥传》,后者无传名。这两篇传记在刘溥传记谱系中属于早期文献,内容完全一致。《〔正德〕姑苏志》成书于正德元年(1506),《国朝献徵录》从始编到成书都在万历年间,所以《国朝献徵录》所收刘溥传记应抄自方志。经比勘,钱氏小传以《志》传为蓝本,朱传相对《志》传更贴近钱传。就上表所列三篇传记共同记载的事件而言,在刘溥世系叙述上,朱传的句式更趋近钱传,改“良医”为“医”,“太宗潜邸”为“文皇帝”;在仕履书写上,朱传与钱传相同;诗歌评价方面,朱传当取自钱传前两句,又改“拟”为“效”,“晚”为“久”。

除语言表达层面近似外,朱传与钱传在事件选取和叙述顺次上也基本一致。钱传依次叙述刘溥姓字、爵里、世系、童年赋诗、长游两京、为官履历、占卜牛祸、诗歌评价、文坛地位、著述。朱传亦先叙及刘溥生平,然后插入刘珏、苏平、苏正等人相关简介,传末又回到刘溥占卜牛祸。若忽略传中所附刘珏等传,便会发现朱传仅将“占卜牛祸”改到传末,又删去钱传所载刘溥著述,余则与钱传同。而《志》传所载刘溥耻以医名、善与人交二事,既为钱传摒弃,朱传亦不载录。由此推知,朱氏直接采入、修订钱传的可能性较大。

朱、钱所作两篇《戴良传》的近似度比《刘溥传》更高,除钱传所载戴良著述和苏伯衡像赞外,其余事件皆为朱传所采,叙述顺序一致,书写层面也极

为接近。就戴良少时授业而言,朱传“又学诗于余阙”显然抄自钱传“学诗于余忠宣阙”;叙述戴良在元末的流亡经历时,朱传改钱传“至正辛丑”为“元末”,“浙东已入职方矣”为“时太祖已定浙东”,删去“张氏将亡”“渡黑水,憩登莱”,余下内容基本相同;叙述戴良为朱元璋征召时,朱传删去钱传“若干篇”“待罪”之语,又改“大官”为“光禄”,余则同。赵友同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实为钱传蓝本,亦为朱传最早史源,但从表中所列传记内容可以明显看出,朱传的语言表达更趋近钱传,是以朱传应抄自钱传,而非径直采摭墓志铭。

朱彝尊以钱氏小传为主要史源的同时,也参照了传主本人之著述文字、墓志铭、笔记等其他史料,以补充钱传之阙漏、裁决钱氏之论断。《史馆稿传·刘溥传》载刘溥送明英宗北伐,“溥从群臣拜伏道左,见日旁气中黑外赤,溥愈忧之,乃赋送驾诗见志”<sup>①</sup>,《志》传和钱传均无,此言出自刘溥所作五言诗《送驾北征》,“其晨日旁气,中黑外如火”“小臣从百官,拜送伏道左”<sup>②</sup>。再如《史馆稿传·戴良传》载“旁及天文、地理、医卜、佛老之书。贯卒,良持心丧三年”<sup>③</sup>,钱传无,戴公墓志铭有载,“故天文、地理、医卜、佛老之书,靡不精究”“公(柳贯)之死,为经纪其家,持心丧三年始归”<sup>④</sup>,朱传当本于此。戴良之死亦可为一证。墓志铭载“遂端坐卒于寓舍”<sup>⑤</sup>,此说没有获得钱谦益和朱彝尊的认同,钱氏认为戴良“卒于寓舍,盖自裁也”<sup>⑥</sup>,朱氏却认为戴良“卒于狱”<sup>⑦</sup>。全祖望也持“瘐死说”,他在《九灵先生山房记》中有言:“九灵意不乐,逃去,太祖大索得之,下狱,以铁钹铛穿其项下骨,卒,火化其尸。”该句下注:“此说见黄存吾《闲中录》。”<sup>⑧</sup>黄存吾即黄溥,《闲中录》又称《闲中今古录》。笔者翻阅《闲中今古录》和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,均未检得戴良死事。另,《九朝谈纂》(佚名)亦摘录《闲中今古录》,戴良条有存,其说与全祖望所

①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刘溥传》,第21页。

②刘溥:《草窗集》上卷《送驾北征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32册,第353页。

③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戴良传》,第11页。

④赵友同: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,戴良: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三〇,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66册,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1985年,第536页。

⑤赵友同: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,戴良: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三〇,第536页。

⑥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前编卷五,第255页。

⑦朱彝尊: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戴良传》,第11页。

⑧全祖望撰,朱铸禹汇校集注: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十八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年,第1095页。

言近似<sup>①</sup>,是以朱传“瘐死说”当本于此。

《史馆稿传》与钱氏小传的高度相似性仅限于前文提到的陈基、戴良、唐肃等传,有些传记与钱传只是部分雷同,比如《贝琼传》《王彝传》《王廉传》《徐贲传》《袁凯传》《林鸿传》《王偁传》《孙作传》《叶子奇传》《杨维禎传》《刘永之传》《唐之淳传》。拿《王彝传》《袁凯传》来说,前者在叙述王彝姓字、爵里、世系、仕履方面比较相近,其余差别较大;后者的相同之处集中在袁凯因忤太祖而佯狂告归一事上。这类传记普遍比钱传篇幅长,原因在于朱彝尊对钱传进行了扩充,引入传主所作之书、奏疏、哀诔等,比如他引贝琼《释奠解》《志古斋记》、王彝《文妖》、王廉《金滕非古书》《宗庙略》、袁凯《请诸将讲经史疏》、王偁《自述诔》、高棅《唐诗品汇总叙》、徐一夔《与王待制书》、刘永之《答梁孟敬书》等入本传。这些书、记、哀诔等皆为传主别集所收,是以别集亦属《史馆稿传》的史料来源。引传主文章入传既是史传书写之传统,也关系到朱氏诗文观的传达,上文已针对《王彝传》引入《文妖》的意图作出阐发,不再赘述。

朱彝尊对钱氏小传的改动还表现为删去诸家诗评和考辨,这类传记有《高启传》《徐贲传》《袁凯传》《孙蕡传》《王绂传》《王冕传》《张简传》《王逢传》《谢肃传》《宋克传》《陈则传》《余尧臣传》《管讷传》《浦源传》《张洪传》《平仲微传》《钱惟善传》。徐贲小传中钱氏对吴人张习所言“幼文以丙辰起家,其卒以癸酉七月馀”<sup>②</sup>展开的考辨为朱氏所删,孙蕡小传中钱氏考辨梅思祖是否延请徐贲至家塾,朱稿亦不存。另外,《史馆稿传》也删去高启小传中王祎、李东阳的诗评,袁凯小传中李梦阳、何景明、程嘉燧的诗评,以及张简小传中顾德辉、王祎、王世贞的诗评。删去钱氏考辨于文意影响不大,但裁剪诗评却关系到朱氏诗学思想的表达。以高启、袁凯传为例,

①《九朝谈纂》载:“方云林先生即戴九灵也,初金华内附,先生曾谒见,谈论征伐取天下之事,甚称上意。后归张士诚,及士诚被执,变姓名曰方云林,避地兹溪永乐寺,时伍拾貳岁矣。越拾伍年,为洪武壬戌,有使者道经本寺留宿。僧具酌,先生同席,言论惊坐。明年,使者还朝,以所变姓名荐,因用礼弊征之于寺,至则内郎附时所谒者。上甚喜,欲大用之,左右啣先生礼貌衰,以草野之臣为言,乃除工部主事。意不乐,遂逃去。上遣人索,于百里之外获之,铁锁穿项下琵琶骨,卒,火化其尸,时年六十七。”(《九朝谈纂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152册,第372-373页)

②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卷十,第1315页。

钱氏引王祎、谢徽、李东阳的诗评入高启小传<sup>①</sup>，李东阳对高启评价尤高，认为高启诗歌不仅才力、声调远超“吴中四杰”其余三人，甚至明代开国百余年无有过者之，隐然视高启为明前期诗人之冠。钱谦益也认为明初诗人首推高启<sup>②</sup>。而朱氏只截取谢徽诗评少量文字入《高启传》<sup>③</sup>，却对袁凯推崇备至。《袁凯传》称“凯诗绝去雕饰，论者推为明初诗人之冠”<sup>④</sup>，“论者”指何景明<sup>⑤</sup>。袁凯的诗歌近体法杜甫，古诗学汉魏，与何景明的复古主张不谋而合，为何景明所推重。朱氏抑高扬袁之举，正本于他宗唐的诗学倾向。

除传记内容外，朱彝尊对钱氏小传的借鉴还表现为《史馆稿传》选人与《列朝诗集》多有重合。据统计，《史馆稿传》所收 90 人，除赵壘、傅恕、傅著等 20 人外<sup>⑥</sup>，余皆为《列朝诗集》所收。朱彝尊编纂《史馆稿传》的意图，亦可借助传记次序窥见一二，列表 2 如下：

①《列朝诗集·高启小传》载：“王子充曰：‘季迪之诗，隽逸而清丽，如秋空飞隼，盘旋百折，招之不肯下。又如碧水芙渠，不假雕饰，翛然尘外。’谢徽曰：‘季迪之诗，缘情随事，因物赋形，横纵百出，开合变化。其体制雅醇，则冠裳委蛇，佩玉而长裾也。其思致清远，则秋空素鹤，回翔欲下，而轻云雾月之连娟也。其文采缛丽，如春花翹英，蜀锦新濯。其才气俊逸，如泰华秋隼之孤骞，昆仑八骏追风蹶电而驰也。’李东阳曰：‘国初称高、杨、张、徐，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，百余年来，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。’”（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卷四上，第 943-944 页）

②钱氏称：“国初之文，以金华、乌伤为宗；诗以青丘、青田为宗。”（钱谦益著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：《牧斋初学集》卷八三《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759 页）

③《史馆稿传·高启传》：“启善文，尤工于诗，徽称其清远缛丽，纵横百出，若八骏追风而驰。”（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一”《高启传》，第 8 页）

④朱彝尊：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二”《袁凯传》，第 14 页。

⑤何景明《海叟集序》称：“又欲取我朝诸名家集读之，然弗多得，其得而读之者，又皆不称鄙意。独海叟诗为长，叟歌行近体法杜甫，古作不尽是，要其取法，亦必自汉魏以来者。其所造就，盖具体而未大耳……海叟为国初诗人之冠。”（何景明：《何大复先生集》卷三四《海叟集序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 2 辑 17 册，黄山书社，2016 年，第 268 页）

⑥另外 17 人是王廉、朱廉、张美和、许中丽、黎贞、唐豫、郭传、夏昶、张益、沈度、沈粲、夏昺、滕用亨、陈登、徐一夔、赵搢谦、答禄与权。



表2 《史馆稿传》传主对应《列朝诗集》位置

| 《史馆稿传》传记次序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列朝诗集》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传一         | 1 汪克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 贝琼(宋禧)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五(甲前集卷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3 王彝(杜寅、张简)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五(甲集卷十五、甲前集卷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4 赵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5 陈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前集卷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6 高启(傅著、谢徽)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四(无、甲集卷十五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7 傅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8 朱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9 王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0 朱廉(徐尊生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(甲集卷十五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传二         | 11 戴良(王逢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前集卷五(甲前集卷四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2 唐肃(唐愚士、谢肃、锺绩、毛铉)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八(甲集卷二十二、甲集卷十八、乙集卷八、乙集卷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3 钱宰(张美和、揭轨、许中丽)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七(无、甲集卷十八、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4 徐贲(宋克、陈则、余尧臣、吕敏)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(四人皆位于甲前集卷十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5 袁凯(顾禄、管讷)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二(四人皆位于甲集卷十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6 孙蕡(王佐、黄哲、李德、赵介、黎贞、唐豫)       | 甲集卷二十一(前四人位于甲集卷二十一、无、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7 王蒙(郭传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前集卷八(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18 林鸿(浦源、郑定、王褒、唐泰、王恭、陈亮、黄玄、周玄) | 甲集卷二十(甲集卷二十、甲前集卷十、乙集卷三、甲集卷二十、乙集卷三、乙集卷三、甲集卷二十、甲集卷二十) |
|            | 19 王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乙集卷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0 孙作(张宣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皆位于甲集卷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1 叶子奇(王毅)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七(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2 王洪(王达、张洪)                   | 皆位于乙集卷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续表

| 《史馆稿传》传记次序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列朝诗集》位置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传二         | 23 高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乙集卷三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4 王绂(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)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乙集卷六(无、乙集卷八、无)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5 沈度(沈粲、夏昶、滕用亨、陈登)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6 刘溥(刘珏、苏平、苏正、沈愚、晏铎、王淮、蒋忠、邹亮、汤胤勳、王贞庆) | 乙集卷七(乙集卷六、后九人皆位于乙集卷七) |
| 传三         | 27 王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前集卷五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28 杨维桢(钱惟善、陆居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前集卷七(二人皆位于甲前集卷十一)    |
|            | 29 徐一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30 刘永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集卷十七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31 赵搢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32 答禄与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|

从上表可以看出,《史馆稿传》大部分传主散见于《列朝诗集》甲前集、甲集和乙集。钱谦益自述这三集依次收入“明太祖元末壬辰起义至丁未建国”“洪武开国至建文两朝”“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天顺六朝”间的诗人及其诗作,基本对应《史馆稿传》中人所处的时代区间。甲前集所收元代遗民和逸民经朱氏删选后,被归入相应位置,如甲前集卷七宋禧入“传一”,卷五、卷四戴良、王逢入“传二”,卷五、卷七王冕、杨维桢入“传三”。而甲集卷十五所收洪武年间参修《元史》的部分诗人亦被朱氏放在“传一”<sup>①</sup>。“传二”自王洪至王贞庆从属乙集,但此前的传记也掺入了乙集中人,如榴绩、毛铉属乙集卷八,却与分别见于甲集卷十八、卷二十二、卷十八的唐肃、唐之淳、谢肃同处一传。由此可以看出,朱氏没有沿袭钱氏纯粹以时间为序、先设“甲前集”的方式排布人物,他将元末至成化这一区间当作背景式的存在,再以政治、地域、诗派为标准分合传记,排列次序,以致《史馆稿传》呈现出一种由甲集到乙集再回归甲前集,甲前集诗人散落在传稿各部的“混乱”状态。

传记的排序体现出朱彝尊的遗民情节与浙江诗家立场。《史馆稿传》“传一”第一人是汪克宽,泰定三年(1326)中乡试,会试不第,遂弃科举,留心经学。洪武二年(1369)征修《元史》,书成不仕。“传二”第一篇是合传,戴良曾在元朝为官,王逢在元末便以隐逸自处,入明后二人都拒仕新朝。“传

<sup>①</sup>即汪克宽、贝琼、王彝、杜寅、谢徽、朱右、徐尊生。

三”第一人是王冕,王冕既没有在元朝做官,也未参朱元璋军事<sup>①</sup>。不仕明的元遗民或逸民被放在每传首位,此举或蕴藏着朱氏的故国之思与仕清悔改之意。正如日本学者竹村则行所说的那样,朱彝尊在这些元明之际的遗民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姿影,藉助这些传记,他确认了自己的明季遗民身份<sup>②</sup>。而他将“会稽二肃”放在吴中、岭南、闽地诗人之前的举措,则反映出朱氏作为浙江诗家的地域本位意识,“传一”修史类文人群体中的汪克宽、贝琼、王彝、陈基、朱右、朱廉在学源上都出自浙东派,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朱彝尊并不完全认同《列朝诗集》,他认为这部明诗总集“自万历后,作者散而无纪”<sup>③</sup>,所以他在《明诗综》中特别增入汤显祖、邢侗、邹迪光、余继登、冯梦祯等晚明诗人。既然朱氏对《列朝诗集》多有不满意,缘何在《史馆稿传》中愿意据之为史源?笔者认为原因有二:首先,朱氏肯定钱氏的文学成就和史学素养。朱氏曾作诗歌《题钱宗伯谦益文集后集杜》云“海内文章伯,周南太史公”<sup>④</sup>,即是对钱氏文坛盟主地位和旷世史学才能的赞叹。钱氏曾有意为史,奈何不为时势所允,其所编《列朝诗集》具有以诗存史的意图。其次,相似的经历引发了朱氏对钱氏的理解之同情。钱氏在满清兵临南京城下时屈节降清,后又私下参与反清斗争,而朱氏则从矢志抗清的布衣变成折节仕清的“野翰林”。二人都遭遇到来自士林的讥讽,钱氏尤甚。钱氏《列朝诗集》蕴藏着对明室复兴的期许,朱氏参修《明史》也有保存明代史事之意。可以想象,身为明室遗民的钱、朱二人在家国倾覆之际的实在体验和哀恸心境是相通的,朱氏应荐赴京时携带的南宋遗民词集《乐府补题》可为一证。

### 三、《史馆稿传》与万斯同、王鸿绪、张廷玉《明史·文苑传》

《明史》各部由纂修官分期撰成后,被送至史馆,万斯同负责斟酌去取,

①王冕是否参朱元璋军事,史料所载不一,朱彝尊持否定观点:“太祖闻其名,授以谄议参军,而冕死矣。”“自宋文宪《传》出,世皆以参军目之,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。读徐显《稗史集传》,冕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。”(朱彝尊著,王利民校点:《曝书亭全集》,《曝书亭集》卷六四《王冕传》,第633页)

②[日]竹村则行:《朱彝尊的遗民意识》,朱则杰:《朱彝尊研究》附录,第271页。

③朱彝尊著,王利民校点:《曝书亭全集》,《曝书亭集》卷三三《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》,第397页。

④朱彝尊著,王利民校点:《曝书亭全集》,《曝书亭集》卷六《题钱宗伯谦益文集后集杜》,第119页。

分合编次,审阅删定<sup>①</sup>。早在开馆之初,万斯同便应监修总裁徐元文的邀请以布衣身份参修《明史》,康熙二十九年(1690)春,史稿粗就,共计四百一十六卷。三十三年,康熙帝下诏王鸿绪、陈廷敬继任总裁,续修《明史》。王鸿绪又延请万斯同至其家,委以史事。四十一年(1702)冬,熊赐履呈进由万斯同主修的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。可以说,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一年,万斯同才是《明史》的实际总裁官。四十一年,万斯同卒于王鸿绪寓所,但这并不意味着《明史》纂修工作告成。四十八年(1709),王鸿绪因议立皇太子被免职回籍,仍带回史馆草稿,加以删改润色,五十三年(1714)进呈《明史列传稿》。次年召还朝后,发现《明史》仍缺本纪、志、表,继续修订,六十一年冬成稿,雍正元年(1723)六月进呈,是为《明史稿》。同年七月,清廷三度开《明史》馆,任徐元梦、张廷玉等为总裁,重修《明史》,至雍正十三年(1735)方纂成。乾隆即位后,下诏以史稿付武英殿镂版。乾隆四年(1739)七月,全书刊成,即今通行本三百三十二卷《明史》。

#### (一)《史馆稿传》与万斯同《文苑传》

现存万斯同《明史》稿主要有四种:1.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十二册;2.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二百六十七卷《明史列传稿》;3.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三百一十三卷《明史纪传》(现存三百〇九卷);4.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。

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内容残缺,目次混乱,缺少《文苑传》,甚至不载单个明代文人传记。二百六十七卷《明史列传稿》设文苑一至六,但正文传记次序混乱,与目录不符<sup>②</sup>。三百一十三卷《明史纪传》设五卷《文苑传》,文苑一到四各占一卷,文苑五、六共占一卷。四百一十六卷本《明史·文苑传》只设三卷,不如二百六十七、三百一十三卷本完备,然三部史稿中明前期文人传(自《胡翰传》至《刘溥附苏平等》)基本一致,仅文字存在细微差别,于下文讨论内容无碍。最重要的是,四百一十六卷本《文苑传》前有序文后有论赞,此为另外两个稿本所无,所以本文选择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为研究对象,探讨万斯同对《史馆稿传》做出的取舍。

<sup>①</sup>钱林:《文献征存录》卷一《万斯同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4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9页。

<sup>②</sup>二百六十七卷本《文苑传》正文次序十分混乱,如《陶宗仪附张宪、周砥等》,按目录,应位于“文苑一”第十二位,在《张孟兼传》和《丁鹤年传》之间。正文中该传处于“文苑一”卷末(第二十一位),眉批“原本在丁鹤年传前”(万斯同:《明史列传稿》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,清抄本,“文苑一”,叶二十五)。《孙作附蒋官、刘永之、叶子奇、殷奎》《戴良传》《瞿佑传》《镠绩附镠师邵等》《聂大年传》《汤胤勳传》等也存在同样问题,此不备举。

将《史馆稿传》与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“文苑一”和“文苑二”进行比对,发现大量传主由前者进入后者。经统计,《史馆稿传》中90名文人,被采入万斯同《文苑传》者多达58人<sup>①</sup>,占半数以上。与此同时,万斯同摒弃了剩餘32人<sup>②</sup>,又新添入40人<sup>③</sup>,终成98人。

不仅如此,朱稿所列单传(如《徐一夔传》)、合传(如王行等“北郭十友”、孙蕡等“南园五子”、林鸿等“闽中十才子”、以刘溥为首的“景泰十才子”)仍然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在万稿中。传记内容上,二者也多有相似。然《史馆稿传》毕竟是独立的分纂稿,当它被改入《明史·文苑传》时,适当的删改十分必要。万斯同对《史馆稿传》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增删传主、调整传记顺次、更改传文三个方面。

万斯同对《史馆稿传》所收人员有所删增,其中汪克宽、杨维桢、钱宰、沈度、赵撝谦值得关注,他们皆为《史馆稿传》所收,万斯同却改杨、钱、沈三人入大传,汪、赵二人入《儒林传》。关于汪克宽、赵撝谦以及新入《文苑传》的胡翰、苏伯衡的归属问题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徐乾学撰写《修史条议》便规定“国初名儒皆元遗民,如二赵(汧、撝谦)、梁寅、汪克宽、范祖干、叶仪、胡翰、苏伯衡诸公,操履笃实,兼有文艺,其为理学、为儒林、为文苑多合而为一。今当为儒林之冠,而后代经学名家,悉附于后”<sup>④</sup>。检分纂稿与万、王、张版《明史》,发现汪琬《明史拟稿·儒林传》收胡翰、赵汧,万斯同二百六十七卷《明史列传稿》、三百一十三卷《明史纪传》、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、王鸿绪

①这58人是:贝琼、宋禧、王彝、杜寅、张简、赵壘、陈基、高启、谢徽、傅恕、朱右、朱廉、徐尊生、戴良、王逢、唐肃、唐愚士、谢肃、镠绩、毛铉、徐贲、宋克、陈则、余尧臣、吕敏、袁凯、孙蕡、王佐、李德、赵介、黎贞、郭传、林鸿、浦源、王褒、唐泰、王恭、周玄、黄玄、王偁、孙作、张宣、叶子奇、王洪、高棅、刘溥、苏平、苏正、沈愚、晏铎、王淮、蒋忠、邹亮、汤胤勣、王贞庆、王冕、徐一夔、刘永之。

②被删去的传记有“传一”《汪克宽传》《王廉传》,“传二”《钱宰附张美和、揭轨、许中丽》《王绂附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》《沈度附沈粲、夏昺、滕用亨、陈登》,“传三”《杨维桢附钱惟善、陆居仁》和单传《赵撝谦传》《答禄与权传》。此外还有王蒙、傅著、顾禄、管讷、黄哲、唐豫、郑定、陈亮、王达、张洪、刘珏、王毅。

③新增入的传记为《胡翰传》《苏伯衡传》《顾德辉传》《杨基传》《张羽传》《瞿佑传》《聂大年传》《乌斯道附郑驹、郑真》《张孟兼附李证》(万稿中此传还附有郭传,即《张孟兼附李证、郭传》,但郭传并非新增人员,《史馆稿传》中朱彝尊将郭传附在王蒙后,成《王蒙附郭传》,万斯同将其改而附在《张孟兼传》后)《陶宗仪附张宪、周砥、马治、高明、吴志淳、朱芾、蓝仁、蓝智》《丁鹤年附李祁、张昱》,以及郭奎、镠炳、张文海、李汶、王行、蒋官、殷奎、镠师邵、镠恕、蔡庸、王谊、郑嘉、李勣、罗颀、张璨、胡粹中。

④刘承乾:《明史例案》卷二,第557页。

《明史稿》与殿本《明史》皆收范祖干、叶仪、梁寅、汪克宽、赵汭于《儒林传》中,并排在该类传前列,可见史官一定程度上采纳并践行了《修史条议》。胡翰和苏伯衡是例外,万、王、张将汪琬《儒林传》稿所收胡翰改入《文苑传》,苏伯衡也始终在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中。就四百一十六卷本《文苑传》而言,万斯同并未全面落实《修史条议》,而是将胡、苏二人放在“文苑一”第一、二位,有意以经学名家统领文士,旨在传达对有道之文的推许,王鸿绪、张廷玉继承了万斯同的做法。

相较《史馆稿传》,万斯同对传记次序也进行了调整,建构起依时序排列的模式。他将“传三”第一、三篇传记《王冕传》《徐一夔传》调至“文苑一”第三、五位,“传二”第一篇传记《戴良附王逢》调至“文苑一”第四位,原本占据“传一”的修史人员被合并成《赵壘附宋禧等》,被后移至“文苑一”第十位。即使后来王鸿绪、张廷玉又新增成员入《文苑传》,这种依循时间先后排列传记次序的模式仍然被承继了下来。

万斯同也修改了《史馆稿传》传文。如《袁凯传》,万斯同径删朱氏称赞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的说法,只说“凯工诗,有盛名”,及其所赋白燕诗为杨维禎所喜<sup>①</sup>;又《高启传》,万氏以明初高、杨、张、徐堪配唐之王、杨、卢、洛,并赞高启在吴中众多诗人中“尤超轶”<sup>②</sup>,与朱氏的态度截然不同,可见万斯同并不赞同朱氏抑高扬袁的做法。万稿《高棅传》也与《史馆稿传》不同,万斯同只在传记中介绍高棅与闽诗派其他成员力追唐音,“闽自林鸿力追唐音,其徒周元、黄元佐之,而棅与王恭颉颃其间”<sup>③</sup>,删去了朱氏驳斥钱氏的言论。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和武英殿本《明史》中的袁凯、高启、高棅三传亦是如此。馆臣对上述文字的删汰,一方面是限于《明史》的整体篇幅,叙述不能太过详尽;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抹去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中因诗歌观点不同而引发的私人论争,尽可能在述而不论的前提下相对客观地展示明代诗歌流变史,使《文苑传》成为集体创作的相对公正的产物,而朱稿反映的宗唐意识却随着典型传记的被改写变得不那么明显了。

万斯同还为《文苑传》作了序文和论赞,以更加明白显易的方式表达其对明代文学尤其是明前期文学的态度。万稿《文苑传序》旨在展现明代文学的流变史,序文将明代文学划分成两个阶段,自洪武至嘉靖,“作者无虑数百氏,其体非一,其格亦屡更,大都指授所归,具有端绪,理必衷于正,气必泽

①万斯同:《明史》卷三八六《袁凯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31册,第131、141页。

②万斯同:《明史》卷三八六《高启传》,第142页。

③万斯同:《明史》卷三八七《高棅传》,第146页。

于醇”<sup>①</sup>，是以近道之文多矣。隆庆、万历以后，文风大变，“理则诡而弗经也，气则靡而弗振也，体日杂而格日陋，古文之道于是乎绝矣”<sup>②</sup>。史官们借此表达尊奉载道之文以及提倡隆庆以前古文的意图。论赞与序文并无本质区别，也是围绕着“道德”与“文艺”的关系谈论明文如何由盛转衰，并进一步将明文之盛的时间圈定在明初。正所谓“明初之文，自金华、义乌而外，遘得胡翰、苏伯衡而下若而人，其学固各有师受，要皆出入经史，自成一家”<sup>③</sup>。此后的复古诸子，“不过以声调取长，华藻竞俊”<sup>④</sup>；更有竟陵派者，“譬之蚓窍蝇声，啾啾细响，大雅有作夫岂其然”<sup>⑤</sup>。

## （二）《史馆稿传》与王鸿绪、张廷玉《文苑传》

经万斯同对《史馆稿传》的采摭与修正，《文苑传》中代表明前期文学成就的传主与传记基本被确定下来，但对清廷来说，《明史》远没有达到可以定稿的程度。王鸿绪进呈的两版明史稿，二百〇八卷《明史列传稿》现存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，三百一十卷《明史稿》藏于国家图书馆。两部史稿的《文苑传》都是四卷，内容基本相同。下文选择《明史稿》分析王鸿绪对《文苑传》的修订。

王鸿绪对万斯同《文苑传》的传记数量、合并方式和排列次序做出了改变。就数量而言，万稿中明前期文人（从胡翰至王贞庆）共计 98 人，有 78 人入王稿，删去 20 人，新增入 24 人，终成 102 人<sup>⑥</sup>。传记分合上，王鸿绪将万稿中张孟兼和郑真（附《乌斯道传》后）附在赵璘传后，合为《赵璘附宋禧、郑真、张孟兼等》；将唐肃、唐之淳、谢肃（唐、谢附在《唐肃传》后）、宋克、余尧臣、吕敏、陈则（四人附《王行传》后）七人附在《高启传》后，合为《高启附唐肃、宋克等》；将吴志淳、朱芾（附《陶宗仪传》后）和张昱（附《丁鹤年传》后）附在新增入的《赵搢谦传》后，合为《赵搢谦附柴钦、张昱、吴志淳等》。

王鸿绪也承继了万斯同对《史馆稿传》的改动，比如增入胡翰、苏伯衡、

①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三八六《文苑传序》，第 131 页。

②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三八六《文苑传序》，第 131 页。

③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三八八《文苑传论赞》，第 186 页。

④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三八八《文苑传论赞》，第 186 页。

⑤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三八八《文苑传论赞》，第 187 页。

⑥王鸿绪删去了“文苑一”《孙作附蒋宫、刘永之、叶子奇、殷奎》，“文苑二”《瞿佑传》《锺绩附锺师邵、锺恕、毛铉、蔡庸、王谊、郑嘉、李昴、罗颀、张璨、胡粹中》，以及郑驹、李证、李祁三人。增入《杨维桢附陆居仁、钱惟善》《王绂附夏昶、张益、平仲微》《沈度附沈粲、夏昶、滕用亨、陈登》三传，以及傅著、赵搢谦、柴钦、乐良、连雨、赵俶、宋广、黄哲、王蒙、郑定、陈亮、陈第。



杨基、张羽、顾德辉、瞿佑,把“传一”修史文人群合并成一篇合传。相比承续万稿改定朱稿的内容,王鸿绪直接采撷朱稿传主入《文苑传》更值得关注。王鸿绪新增杨维桢、王绂、沈度、赵搢谦、王蒙入《文苑传》,这五人《史馆稿传》有收,却为万稿所删,列表3如下:

表3 王蒙、王绂、杨维桢等所属类传比较表

| 《史馆稿传》 |                  | 四百一十六卷《明史》 |           | 三百一十卷《明史稿》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传一     | 王蒙(郭传)           | 文苑一        | 无         | 文苑一        | 王蒙(郭传)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传二     | 王绂(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)    | 无          |           | 文苑二        | 王绂(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)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| 沈度(沈粲、夏昶、滕用亨、陈登) | 列传五十二      | 沈度(沈粲、陈登) |            | 沈度(沈粲、夏昶、滕用亨、陈登)           |
| 传三     | 杨维桢(钱惟善、陆居仁)     | 列传二十八      | 杨维桢(郭冀)   | 文苑一        | 杨维桢(钱惟善、陆居仁)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| 赵搢谦              | 儒林一        | 赵搢谦       |            | 赵搢谦(柴钦、乐良、汪雨、赵叔、张昱、吴志淳、朱芾) |

由上表及朱、万、王三稿传文可知,万稿不收《王蒙传》,只在《张孟兼附李证、郭传》中提及王蒙<sup>①</sup>,王鸿绪却采朱彝尊《王蒙传附郭传》入《文苑传》,传文甚是相似。王稿《王绂附夏昶、平仲微、张益》和《沈度附沈粲、夏昶、滕用亨、陈登》与《史馆稿传》传文近似,万稿不收前者,改后者入列传,并删减附传人员。赵搢谦由《史馆稿传》进入万斯同《儒林传》,王鸿绪改入《文苑传》。王鸿绪《赵搢谦传》是《史馆稿传》的简化版,他删去朱稿所引赵搢谦“六书”之论和临终遗言,留下了赵搢谦与乐良、张昱等人的交游往来,故该传后又附柴钦、乐良、张昱等。对于杨维桢,史官汪琬也作有《杨维桢附郭冀》,隶属《文苑传》,万斯同采汪传入列传,王鸿绪却引朱传入《文苑传》。就传记内容而言,王鸿绪《杨维桢传》融合了朱稿与汪稿,亦参考《列朝诗集》杨维桢小传,自“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,造门纳履无虚日”至“时庚戌五月,年七十五”<sup>②</sup>与钱氏小传一致。附传《钱惟善传》《陆居仁传》与《史馆稿传》完全相同。

①“传本郭姓,字文远,后偕王蒙、华克勤入胡惟庸第观画。惟庸诛,三人并坐死。”(万斯同:《明史》卷三八六《张孟兼附李证、郭传》,第139页)

②王鸿绪:《明史稿》卷二六六《杨维桢传》,雍正元年敬慎堂刊本,国家图书馆藏,叶二至三。

王鸿绪将万稿中隶属大传的杨维桢和《儒林传》中的赵搢谦改入《文苑传》，我们需要联系殿本《明史》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张廷玉又改大传中的危素、张以宁、石光霁、秦裕伯入《文苑传》。王鸿绪和张廷玉将这些人降至“文苑传”，意图有二：第一，承继万斯同以经学名家统领文士的做法。赵搢谦师金华郑四表，尤长六书之学；危素少通五经，游于吴澄、范梈之门；张以宁治《春秋》有声；石光霁从学于张以宁。这些人的加入，壮大了通经善史这类文人群体，由此也可看出清代馆臣对明初实学的推崇。第二，扩充、完善明初文人群体规模。张以宁可谓闽诗派的先驱，危素是明初江西派的代表，张以宁的加入，加强了明初闽诗派与元末闽地诗坛的联系，危素的加入则弥补了自《史馆稿传》至王鸿绪《明史稿》不收江西派成员的缺失。

王鸿绪也调整了传记次序，尤为明显的是，他将新增入的杨维桢放在“文苑一”首位，万稿《文苑传》第一人胡翰被移到第二位。从文学的视角看，明初文坛与元末诗坛相互交织。杨维桢堪称元末江南诗坛的领袖级人物，他的诗歌奇博、炫露、纤秣。袁凯、贝琼、杨基、瞿佑、张宪、郭冀等都是他的弟子，在诗歌风貌上，他们与杨维桢也有相似之处。事实上，即使是被视作一扫元诗绮靡之弊的高启，其创作也并未完全摆脱元末诗坛风尚的影响。朱彝尊、王鸿绪以及此后的张廷玉将杨维桢归入《文苑传》，何尝不是考虑到杨维桢在元末诗坛的影响力与文学发展的接续性。而由杨维桢替换掉胡翰，不再默许以经学名家统领文人群体的做法，则使《文苑传》逐渐回归文学本位。这种回归不仅体现在杨维桢的位置变动上，王鸿绪版《文苑传序》的表述更为直观。该序不以文道关系审视明文之流变，而是将诗歌也纳入其中，分述明初、永宣、弘正、嘉靖、启祯五阶段的作家流派、诗文宗尚与创作风格，清晰地展示出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。王鸿绪以“盛”“弱”“变”分别指向明初、永宣及此后的诗文。明初文学“蔚然称盛”，善文者有宋濂、王祿、方孝孺，长于诗者有高启、杨基、张羽、徐贲、刘基、袁凯；永乐、宣德年间“气体颇弱”；弘治到崇祯间则突出一个“变”字。

继王鸿绪后，张廷玉等重修《明史》时，考虑到《明史》已基本成书，便主张对王鸿绪《明史稿》稍作增删，考其疑事，补其阙漏即可，无需一一考核复审<sup>①</sup>。就《文苑传》而言，殿本《明史》多将王稿《文苑传》中的明前期文人传由单传变为合传，如王稿中丁鹤年、顾德辉、杨基、张羽、徐贲、高棅皆为单传，殿本《明史》将丁鹤年并入《戴良传》，成《戴良附丁鹤年、王逢》；顾德辉并入《陶宗仪传》，成《陶宗仪附顾德辉等》；又并杨基、张羽、徐贲入《高启

<sup>①</sup>汪由敦：《松泉文集》卷七《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72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94页。

传》，成《高启附杨基等》；并高棅入《林鸿传》，成《林鸿附高棅等》。如此一来，明前期文人传就由王稿中的 27 篇减少至 21 篇。两部《文苑传》所收明前期文人数量相当，王稿为 102 人，殿本《明史》为 103 人，张廷玉删去贝琼、汤胤勳、黎贞、陈第 4 人，增入危素、张以宁、石光霁、秦裕伯、孙作 5 人。

张廷玉等还裁剪了王稿传记少许内容。以《王冕传》和《戴良传》来说，张廷玉删去了前者所载王冕“不十年，此中狐兔游矣，何以仕为”<sup>①</sup>之言，以及后者所载苏伯衡“其跋涉道途也，类子房之报韩；其彷徨山泽也，犹正则之自放”<sup>②</sup>像赞之辞。适当删略有助于提高文风的雅洁程度，但有时不顾上下文意的削减，却会造成谬误。如《乌斯道传》（附《赵壘传》）中载“斯道工古文，兼精书法。子缉，亦善诗文。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，授临淮教谕”<sup>③</sup>，经比勘王稿，发现“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”前尚有“真，字千之”<sup>④</sup>。真即郑真，他与乌斯道为同郡文士。郑真在洪武四年中乡试第一，授以临淮教谕。考王稿、万稿、黄润玉《〔成化〕宁波府简要志》及嵇曾筠《〔雍正〕浙江通志》等皆然。殿本《明史》删改不当，遂成乌斯道的儿子乌缉于该年中乡试。

要之，朱彝尊以单、合传整合人物，综合传主人仕先后、政治行为、地域分布等因素排列传记，修成明前期文人传稿——《史馆稿传》。墓志铭、方志、别集、笔记等固然是《史馆稿传》的史料来源，但朱彝尊显然更青睐《列朝诗集》。他在承继、修改钱氏小传内容与传记顺次的过程中传递出个体化的诗文观，表达了与钱氏或同或异的存史意图。朱彝尊绘制的明前期文苑图谱，尊奉的宗经尚雅古文观，为万斯同、王鸿绪、张廷玉所承继。而他们进行的传主增删、传序调整和传文更改，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稍稍修订《史馆稿传》而已。分析《史馆稿传》的编修与内容，以及万、王、张三人在此基础上的修正，不仅对重新审视《史馆稿传》的文献价值有所帮助，对研究《明史·文苑传》的生成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。

【作者简介】谢一丹，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明清文学与文献。

①王鸿绪：《明史稿》卷二六六《王冕传》，叶四。

②王鸿绪：《明史稿》卷二六六《戴良传》，叶五。

③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五《乌斯道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7319 页。

④王鸿绪：《明史稿》卷二六六《赵壘传》，叶七。